

媒介研究、技术创新与知识生产：来自媒体考古视野的洞见——与齐林斯基教授的对话

潘霁 李凌燕

摘要

本文围绕媒体考古学发展动态、中国媒介技术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化知识生产等内容，与齐林斯基教授展开深度对话。旨在凸显媒体考古学之于当下理论和现实相关性，与为理解中国媒介现状与未来发展所提供的独特洞见。

关键词

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深层时间、媒体技术、知识生产策略

作者简介

潘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电子邮箱：panji@fudan.edu.cn。

李凌燕，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lilingyan@tongji.edu.cn。

本项目获复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xw020）支持。

DOI:10.13495/j.cnki.cjic.2020.07.005

Media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sights from Media Archeology——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Siegrfried Zielinski

PAN Ji Li Lingyan

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started an in-depth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Siegrfried Zielinski to discuss the advancement of media archeology, especially its implications for digital media stud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tworke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Via this conversation, the discussants intend to explicate the distinctive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relevance of media archeology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technologies in China.

Keywords

Siegrfried Zielinski, media archaeology, deep time, media technolog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strategy

Authors

Pan Ji is a Professor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in Fudan University. Email: panji@fudan.edu.cn.

Li Lingy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Media and Art School in Tongji University.
Email: lilingyan@tongji.edu.cn.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Young Scholar project (16cxw020) and Fudan's excellent discipline fund.

对谈人：潘霁、李凌燕

统稿：潘霁、李凌燕

媒体考古学著名学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教授，是瑞士欧洲研究生院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专题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布达佩斯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博士、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媒体考古学领域研究并出版与发表了丰富的著作和论文。2019年，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教授受聘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兼职教授，开设系列讲座并主持相关跨学科课程，聚焦中国语境下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关键工程与技术实践、未来材料与混合自然、多线性叙述和跨媒体实验（包括VR，AR等）等媒介交叉性研究，希望推进媒体考古学的前瞻性实践与理论拓展。作者有幸与齐林斯基教授共同负责城市传播课程，并就媒体考古学的动态、中国媒介研究、数字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展望等媒体考古学的理论和现实相关性问题和教授展开对话，旨在揭示媒体考古学对理解中国媒介当下发展提供的独特洞见。



图1：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¹

一、媒体考古学的最新动态

作者：首先可否请您谈谈最近的研究兴趣及进展？

齐林斯基（以下简称齐）：十分荣幸！我近期正同时推进四个不同方向的研究：首先是一个名为《神父机器》（*Priest Mechanics*）的项目，尝试研究时间测量和时间控制谱系的特定维度。简单说来就是探究钟表技术如何成为多重现代性的元机械装置。我在同时研究智能机器和所谓“单身汉机器”的传统时，有趣的关注到特定宗教实践和精准技术劳动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如雷蒙·卢尔（Ramon Llull）所说，每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师。来自不同传统（佛教、基督教、穆罕默德主义、犹太教……）的僧人、牧师、神学哲学家，同时都是具有很高天赋和才华的机械师和工程师。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有大约1000年——介于公元8世纪的中国与18、19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之间。

几年来，我一直在构建一所想象中的未来学院/大学，尤其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新的学科院系（*new faculties*），以应对我们正在面对和未来即将面临的复杂挑战。传统的学科体系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了。在我所希望看到的未来新学科设置中，有一项是着力于培养大家阅读和解释风的能力（*the ability to read and interpret the winds*），并且能教授作为一种新文化技能的航海术。

此外，我正在编写一部题为《物质学和变体学》的专著，以便有针对性地总结近几十年来自己研究和教学背后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专著以“超越学科（*Beyond the discipline(s)*）——自由而无限的思考——垂直和水平的辩证”或“世俗性（*Mundialité*）——知识从非地方性或国家性”或“海洋与领土式思考”“去疆域化——进入开放状态——航行——建立联系”“——邂逅的唯物主义——作为早期材料学家的原子论者”“古未来主义”为章节题目，试图概述支撑自己深层时间和媒体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思想观点。

第四个项目仍“犹抱琵琶”。大约30年来，我致力于探究一种关于楼梯和梯子的唯物主义考古。梯子是人类文明史上用以理解和划分世界最为古老的形式和设计。目前，项目暂以“摆进摆出（*swinging in and swinging out*）”为题，或也可用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博士论文的题目“重复与差异”来命名。其中建筑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楼梯连接天堂人间，在上升坠落间中介斡旋……通过此项目我意在讨论物的秩序与思想秩序之间的相互关联。

作者：可以分享一下媒体考古学研究领域最新的重要进展吗？

齐：首先，媒体考古学被人文学科广泛接受，并已成为许多大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领域，这是至关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我已受邀前往世界各地多所大学就此话题进行研讨——从北京到阿布扎比、从奥斯陆到那不勒斯或者是伊斯坦布尔、从里

约热内卢到比宜诺斯艾利斯或哥伦比亚等等。媒体考古学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得到广泛承认。但是众所周知，这在学术界并不算长。

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大家试图更为激进地理解我为媒介研究提出的“深层时间”概念。这意味着我们对当今数字文化深层、甚至是古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开始发问。人们开始思考借以交流的物从何而来？它们从何种远古物质直接或间接地衍生发展而来？历史资源的输入和产出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媒体考古及其生态的未来将如何发展？青年学者中包括来自芬兰的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正追寻这些研究方向推进。同样让我欣喜的是媒体考古学正在横向拓展。这意味着，媒体深层时间问题，不仅在西方文化中，而且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当然还有中国也越来越为人关注。《变体学——艺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深层时间关系》（*On Deep Time Relations between Arts, Sciences Technologies*）丛书在此进程中无疑占有一席之地。



图2：《变体学——艺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深层时间关系》丛书²

二、深层时间意义下的中国媒介研究

作者：您曾指出媒体考古学与相关艺术实践的乌托邦潜质在于将两个对立的时间轴联系起来：一是回到未经探索的文化积淀深处；另一个则是与之相反地指向不透明的未来。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多数媒体技术都是舶来品。例如，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桥头堡，在1920到1930年代有大量西方的技术奇观（如电灯、汽车和电话）迅速涌入，直接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碰撞。新技术与旧传统的断裂尤为剧烈。如此语境下，如何合理地将中国本土文化与未来的技术发展连接起来？如此尝试能激发出怎样的惊喜？又如何能让我们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受益呢？

齐：我们可以用1928年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当时通过新媒体

广播介绍他作品时的一则有益的寓言故事，开启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一个来自于欧洲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年长智者。这位年轻人对欧洲人迄今为止所有的技术发明感到非常自豪。这位来自中国的智者问他：“你们有什么呢？”年轻人答道：“我们有火车、汽车、电话……”，“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的是”，这位来自中国的长者礼貌地回答，“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同时反思和打开深层时间（与平滑历史相反）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

媒体，甚至所谓的新媒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成为产品、基础设施和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电信、信息通讯、智能机器、技术图像是在一两百年前才被发明的。这仅仅意味着工业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过去的知识，更有效地基于过去创造了各种发明，并且加速了其作为商品的生产。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交流，甚至是依赖网络技术展开沟通的想法和概念也要古老的多。在深层时间的视角下，我们能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找到电影的原始形态，在13世纪的马略卡岛发现带有人工智能意味的人造物，或者是在11世纪的中国找到复杂的机械计时装置。所有的先进媒体，都是时间机器或者说扩展版的时钟。

这就引出了一个大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欧洲思想家发明了现代性概念，以建立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认识论霸权。正如1999年罗丽莎（Lisa Rofel）在其著作《另类现代性》（*Other Modernities*）中对中国的分析，我认为“现代”不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变体。出生于阿根廷的人类学家加西亚·坎克里尼（García Canclini）在1990年出版的《混杂文化》（*Culturas híbridas*）中阐述了南美大陆多样现代性的现实：“我们并未抵达同一种现代性，而是牵扯进几种不平等且相互纠缠的现代化进程。”（Canclini, 2009）从某种意义上说，星丛（constellation）代表了永恒的动态生成过程，更能够成为现代性的意象。星丛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地都发生着演变，且可能绵延到未来。从艺术、科学与技术间的深层时间关系视角看来，我能够理解对世界所持的某种态度代表了现代。这种态度使个人生活在与周围整体环境的实验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并不强调检验，挪用或开发。世界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个体被周边所有的“他人”理解成可被改变的一样。理想情况下，两者都会变得更好。

对于历史、现在和未来是否“卓越”（excellence）之判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多样性（variety）、繁复性（manifoldness）和我们所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差异化（diversity）。这三个概念属于同一语义邻域。如今人们对于世界每一分钟失去一个物种变得司空见惯，多样性在过去已被急剧减少。面向全球市场，技术的标准化

可能会为个别企业带来经济优势，但它也导致了标准化的剧增——究其本质，加剧技术文化的贫乏。从长远来看，标准化意味着文化思维和行为变得多余。当然，这对于未来城市及城市规划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在深层时间媒体研究或者媒体考古学中提出的时间机器的乌托邦维度，是指想通过重新探索过去存在的丰富异质性和多样性，并让它们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和对未来的期望相碰撞，以此创造出“惊奇发生器”（这个概念源于分子生物学家马伦·霍格兰（Mahlon Hoagland））。我从“古旧”中挖掘出来的“新奇”恰恰就是思想、方法、概念、模型的多样性，并以此激活未来的各种可能。比如：对于隐私保护和秘密交流的巨大需求并非只有在互联网成为大众媒介之后才有。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密码学和隐写术的诸多手段策略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人们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总是极具创造力，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在对话开始我还需强调的是，深层时间研究应该教会地球人谦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宇宙漫长发展面前，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我们需要赖以生存的地球，但是地球需要我们吗？我们对“招待我们的地球主人”友善吗？对此我表示怀疑。这与世界范围的交流也有所关联。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人类文明存在之前交流已经存在，人类“退场”之后仍将有多多样性的传播交流存在。弗里曼·J·戴森（Freeman J. Dyson）1979年发表的《时间无止境——开放宇宙中的物理学和生物学》（*Time without end: Physics and biology in an open universe*）非常精彩，对我影响颇深。他认为深层时间媒体研究中的宇宙维度是最为复杂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作者：当未来考古学的概念被用于中国城市传播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实践案例中，传统建筑或流畅或者尴尬地与当今数字媒体技术混合杂糅，并将未来的影子投射到现在。其中许多建筑景观象征着现代性与古老权威的融合，这也与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发生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利用媒体考古学的洞察，为我们集体的未来揭示更多可供替代的可能性？

齐：异质性和多样性应该成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发展卓越与否的决定性标准。我们不会一直需要越来越多的相同——只需要更高、更快、更大一点。但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令人兴奋且宜居的多样性：在剧院、电影院、书店、饭店、建筑物、公园、植物、自然之中。比如中国传统的服装设计在如今时尚和产品设计的新美学概念中得到实现，这使得像Uma Wang这样的当代著名设计师，或是来自于上海、深圳的青年才俊成为世界顶尖人才。那些在时间维度上扁平形态的文化（例如像美国这样的扁平文化）不会有如此丰富的审美体验。再比如我非常沉迷于探究中国收藏家和艺

术活动家例如张颂仁（汉雅轩）如何在当代重新激活几百年前的诸多园林理念，如何于自己在苏州的艺术学校中，将古老的中国炼金术概念引入当代艺术教育。

对于一个至少说来都会受人工生命形态和智能机器强烈影响的未来而言，挪用或通过传统文化技艺来工作变得极端重要。迈向未来的巨大飞跃往往都需谨慎且富有成效地假道历史过去。当代范式的事件和主角都朝着生物设计和人工智慧转移，都在探索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精准算法命令与神秘魔法之间，被拓展物和思维及未拓展物之间“走钢丝”。这一切与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设想的差异相符。中国文明并不需要与欧洲现代性发展类似的戏剧性范式转变。中国的《易经》以及五行转换学说，让其具有紧凑的思想史和普适的诠释学（特性），能以不断变化的状态理解和描述世界。中华文明甚至整合了二进制编码思想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一思想直到17世纪才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关注到。同时，欧洲现代性教会我们严格区分物质和智识精神的异质现实。尽管一些对此最杰出的拥护者自己也乐于涉足魔术师的学说以及魔法师学徒，庸医和早期基因操作者的疯狂实验。因此，我提出扩展的物质学（expanded materiologies），就是提倡让我们用一种新扩展的解释学来与新的多重现实相遇：新的现实杂糅了各种可计算的控制系统和现实中神经敏感的物质。关于上一个100年的历史，我已经开始了一个题为“柏林媒体思考及行为地图集”（ATLAS of Media Thinking and Media Acting in Berlin）的时间地理（chronotopographical）项目，并在2016年在柏林新媒体艺术节（拥有30多年的历史）上进行展示。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重新建构了20世纪及21世纪初期对于媒体思想及行为而言重要的地点、事件、人物以及机构要素。结果之一表明，动态地图不仅可以充当过去的指引，同时也能为迈向现在和未来指明方向。柏林城市特有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对于发展激动人心的媒体和文化的重要意义，再次凸显。

作者：您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您对物理和形而上学，精确的算法命令和模糊魔法之间的复杂纠缠展开的理论思考吗？艺术与媒体考古学理论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齐：首先，当我谈到艺术，我指的是一种原则上受科学技术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当我谈到科学，我设想的科学观念是多孔开放，并且对于各种艺术充满明显的好奇心。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艺术（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艺术，那我们所说的科学有特定指向。我们需要诗意的、且带有诗意思考能力的科学；我们需要有能力想象艺术的、甚至其自身能够采取诗意的实验形态的科学。在艺术工作室或实验室的工作包括开发、调查、测试、丢弃

以及获得结果。这些活动涉及艺术实践中一种能够与科学，乃至工业共同的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在艺术中更为重要。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艺术与其他行业产生区别的特征：直觉。这与艺术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动力来源紧密关联——“想象力（德语Einbildungskraft）”——积极活跃想象与投射的力量。

我们也可以从认识论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我的《媒体考古学》一书正是为了将数学和想象——更抽象地说，将计算理性和超越计算理性的思想连接成冲突共生的关系。数学（mathematics）一词，在这里是指其原始含义。作为数论理论中一门特定的学科，直到15世纪，它才在我们的西方文化圈有了明确的含义。起初，数学一词带有更多含义。数学一词（the ars mathematica）源于希腊词manthanein（去学习、体验、理解）。“ars mathematica”包含了所学的一切，已获得和可获得的知识，科学在此作为整体。想象、幻想、想象的力量在它的定义中边界模糊。然而，我们可从其在思想中的位置，辨别出两条重要原则：想象描述的是一种与理性思维既对立又互补的心理活动——对此人工智能理论家会谈及不能被算法化，或者相应算法过于复杂，我们尚不清楚，以至于无法计算的心理活动。以图像形态表述，它与感官知觉的关系要比与记忆或比率的关系更为紧密。但对我来说，两者毫无疑问都在各自的概念和范式中存在。若缺乏想象，所有系统、所有严格合规的都将变得冰冷虚无。就像违反无禁忌的禁忌是无法想象的一样，甚至即使是数学，如果不参照其在思维上强大的对应物，想象也仅留苍白的外表。或者简而言之，我的工作是不停地呼吁分析描述理性如何能够与感官经验之间产生富有成效的交互。

三、数字技术创新

作者：数字媒体渗透到日常生活，显著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加速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大多数社会进程的主导逻辑。这种情况下，我们与深层时间发生联系和看到过去技术文明星系的能力和想象是否受到影响？技术近视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对此能做什么？

齐：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低的复杂程度来理解和使用加速概念，那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术语。2019年，我从柏林飞到上海要15个小时；如果我想要在伦敦市内旅行，比如说从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到布里克斯顿市场（Brixton market），坐车需要一个小时——与大约1900年时人们使用当时的交通工具所花费的时间一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已经大幅加速，而另一些则完全没有——恰恰相反，它们放慢了速度，甚至完全停了下来。地球不仅在变暖，同时也在变老，它

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所有的先进媒体都是时间机器。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干涉给定的时间结构。时间已经成为一个技术对象。所以，只要我们想的话，我们可以加速时间、扩充时间、放慢时间、改变其节奏或者是冻结时间。每一部相机、每一部眼屏电话都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眼屏电话是实现时间的机器。我们通过互联网不断更新时间，却失去了生活和享受当下的机会。我很多年前便在许多发表作品中谈论过这个话题，并为此呼吁恳求。为了避免因为存在在时间中卷入太少而感到偏执，或因在时间中存在过多而认为自己生活在土星环那样的忧郁痛苦之中，培养有意识的分裂会有帮助。我们在技术网络中筹备、学习、辩论和娱乐。而我们在独人或与人共处的独立场景中热衷、思考、享受、信仰和信任。这相当于一种平衡行为：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线上存有（exist）和线下存在（being）。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成功，我们终将成为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附属，沦为其技术功能。

当然，思考“分裂”背后有其哲学背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是德国对哲学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的最富有成果的著作之一。在论述国家的章节附录中（p. 270），黑格尔区分了存有（existing）和存在（being）。这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指向存在（existentia）和本质存有（essentia），也即仅仅是存有和无条件存在之间的差异。这一对关于本质的不同概念跨越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这种区分牵涉到个人是否和如何与整体发生联系，与整体的联系又是否被认为和被反映为必然。或个人特殊性是否被视为充分，也就是简单的存有（exist）。“现实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把普遍性分解为特殊性之后，后者看上去就能够自足，但实际仍需整体的维持和支撑。若此统一缺席，则无事无物可能实际存在（actual），即便其被假定能保生存有（exist）”（Hegel, 1991: 302）。

作者：您提到重建或重新处理古代媒体技术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展示它们。正是这些旧技术设备暴露出来的缺席或不完整性，激发当前的媒介创新。您能详细说明这些技术创新与主要由大资本或权力推动的创新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您有没有实施任何项目来实现这个过程？

齐：从我们最近的研究和展览实践来看，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我们举办的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卢尔的智能机器展。这个项目触及了今天所谓人工智能的实质。

我们的项目《对话——雷蒙·卢尔和组合艺术》关注马略卡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卢尔（公元1233年—1316年）。卢尔的生活和工作一直吸引着当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他普世的观念和思想对文学、视觉艺术、音乐、哲

学、逻辑学、宗教和政治等领域都有所影响，范围涉及到信息理论、信息学和媒体技术。在思想史上，卢尔的组合学（combinatorics）对于开发先进媒体技术时所应用到的生成原理和算法原理极其重要。尤其是其作品背后的“绝对对话”（absolute dialogue）原则，对于如今知识和价值转化传递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各种争议特别相关——他为我们指明了“在相互认可中共存的条件”。让我举一个例子，它将我们的项目与中国知识文化的深层时间联系在一起。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是数理逻辑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计算器等装置方面的理念和方法革新了哲学和技术领域。卢尔的作品是其重要的灵感来源。正如卢尔的组合学原理将诸如犹太教卡巴拉教派的神秘主义和阿拉伯天文学这样的不同文化知识串联起来，莱布尼茨的组合研究同样记录了他对完全不同文化的知识。在其组合学研究中，他对中国古代占卜文本《易经》中基于卦的逻辑，尤其感兴趣。在莱布尼茨一份著名的手稿中，他曾在易经卦图中加入了阿拉伯数字，以分析其操作性。除了这本手稿，我们的展览还展示了莱布尼茨计算器的复原版以及卢尔的不少手工制品。他们证实了现代数学逻辑和算法原理的起源：唯有来自于不同文化的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孕育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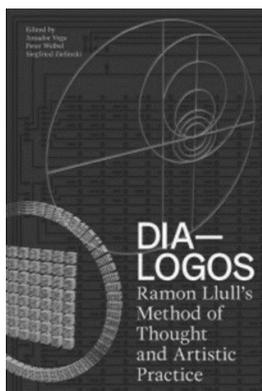


图3：图书《对话——雷蒙·卢尔和组合艺术》³

从当今视角看，卢尔的研究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逻辑机械建立起道德准则和传播技术之间的深层联系。他最重要的观点在于：没有深入的对话就没有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没有共同语言就没有对话！这些原则尤其适用于以文字文本为基础，倾听言说的信仰和宗教抉择——就像这个世界上强大的一神论宗教一样。在欧洲中世纪末，卢尔对这一点的理解带有激进的清晰性。在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和相互侵占的时代，他想出了组合技艺（ars magna法则的

总称），以此作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交流的巧妙方法。这便是卢尔发明这个用作交流的、小小的（且十分美丽的）纸本语言机器的强烈动机。这些都是最初意义上的媒体，你也可以称它们为古计算机。如今，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却恰恰相反。人们孜孜不倦地开发程序和机器，以开发更高级的逻辑运算，之后才会去思考他们发明的各种伦理后果。

作者：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给理论搭建带来了哪些机遇？如何看待当“算法”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及它新的特质？如果我们站在遥远的未来，回顾当今媒体技术的变化，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对于未来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齐：我认为过去几年中最重要的洞见是，我们需要更加整体性地思考技术和媒体。控制外部世界的机器和程序以及我们用以沟通交流的工具同我们的生物群体构成了一个整体集置，人类和植物、动物、气候、大气层一样。《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中提到，人类必须再度游戏，以找到自己在这个整体中的特定角色，且只能是一个担忧者的角色——一个懂得关心并且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人机之间的合作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在历史新的整体集置中，主体间性的概念被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的概念与现实所补充。

同时在此背景下，请允许我谈一谈我“媒体思维”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和理论原则。就技术和文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言，我既不相信如弗莱德里希·基特勒学派（Friedrich Kittler's school）所主张的技术先验（technical a priori），也不相信像那些深耕于“批判理论”的人所主张的文化或政治经济先验（cultural or political-economical a priori）。相反，我认为二者是动态交互的。技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依然是文化的；同时，文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牵涉技术。这意味着，在有些人类共处的条件下，智能程序和机器的干预是有意义的。但在另一些条件下，算法干预将成为一种（计算机控制的）过度组织。以技术的方式解决生态问题并不是后现代都市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同时从技术和生理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深刻思考我们的儿童和后代将在何种条件下出生。自然世界不再属于我们，它已成为我们的共生体。

有人说，由于许多愚蠢行为和误用，通讯网络已经变得令人厌倦和适得其反。我们如今可以观察到大量实例。在德国，右翼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互联网上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对此我们无法再加以监视。但我深信除了对话，我们别无选择。连通性（connectivity）是我们不应该也不会放弃的成就。对很多人来说，大型和小型网络在20世纪迈向21世纪初时才从技术意义上被有效地开发起来。而未来的几代人

则将高兴地在媒介系统的整体背景中回顾这一创新。现在我们仅仅处在网络和连通性作为文化技术开发的起步阶段。

作者：人工智能深刻重构了网络交际中批评话语与实践的关系。机器学习（如神经网络、机器算法等）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您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创新驱动的技术话语对传播研究的影响？这将带来哪些技术突破和机遇？

齐：2016年，当我受邀担任卡尔斯鲁厄ZKM艺术中心附近一所艺术与设计大学的负责人时，我设立了机器智能方向的教授席位。这是第一个理论方向的终身教职，由年轻的意大利媒体哲学家马特奥·帕斯奎内利（Matteo Pasquinelli）担任。他将这个实验性领域发展成一个在两个极点间摇摆的奇妙部门：一方面是神经网络在音乐创作和设计艺术中的实验性应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智能程序和智能机器批判性和哲学性的检验。我将其称之为“外部智能”（extelligence），因为它们仍在我们的生物体外运行，也就是与我们相关联或是相连接的外部装置上。在人体中植入人工心脏起搏器，心脏瓣膜或机械髋关节时，我们都须格外小心。我希望从长期看人类未来实现生物和技术的混杂存在，将智能植入身体时，至少需要保有同样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和伦理问题再怎么说不为过。

就智能机器的未来而言，我认为数字计算机只是融合各种数字和模拟技术的初步阶段。从长期看，可能还是以模拟电子、化学和生物为主。数字技术尽管如今看来无比强大，但仍然本质上是机械技术。就像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曾经声称的那样，数字计算机是一台万能机器。在涉及统计、算术以及精确命令的执行方面，它非常强大。计算机在个人或特定事件和现象的特殊性和抵抗性遭受威胁时，就显得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在所有领域中最感兴趣的艺术世界。

智能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或者根本什么都不是。我认为数字技术不会成为解决未来所有可能问题的灵丹妙药。物质的特殊性、个体性和抵抗力，可能通过其他非数字形式的智能得到更好发展。目前，我对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 EI）项目非常着迷，因为它在诸如机器人科学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具身智能假设在包括花草树木之类的物件物质中存在着大量聪明机变（cleverness）甚至是智慧（wisdom）。智能本来就未必要从人的身体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它十分有限。借助像电影放映机（bioscope）——19世纪早期的胶片相机和放映机之一——这样的媒介，人们已经能够在屏幕上展示生命，来用技术成像和屏幕的形式赞颂生命过程。未来的生物媒体（bio-media）就其本身而言，将会是技术和生物的共生物。生物媒体将展现生命特征，区分技术和生命将会困难重

重。智能机器不会与我们对立，而是会融入我们内部。

作者：您认为对于想要研究媒体考古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对您而言，在中国对一个媒体考古学家而言最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是什么？

齐：在我提出的媒介思想中，技术多重的起源、派生和未来复杂且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认为那些具有丰富深层时间体验的文化也能够发展出让人激动并适宜生活的未来。但这一切都不是自动生成的。我把过去和未来看作是可能性的空间——潜能空间（potential spaces）。换句话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依据与自然和社会的契约来开发它们。我将探索这些问题的学科称为古未来主义，并坚持认为这个学科是不可或缺的。我喜欢去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有深度的文化之一。从许多方面看，它可能是最为深远的。中国的深层时间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概念及对支持双方沟通交换的“第三方”也就是媒介的物质化实现，这涉及到音乐及乐器，语言及写作，各种视觉艺术及电力，光学，精密工程等等。大学和艺术院校理应将开发这些财富视为通向未来可能性的大好契机。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知识，才华和能力重访过去的“现时”（past presents）从中生成新的东西，发现尚未发现的，以前未被注意的或被边缘化的各种美妙事物，并将它们发展为现在和未来的灵感。不仅是一个奇妙的挑战——无论如何，他们都置身于两种文化之间。

四、知识生产的挑战与补充

作者：未来媒体考古学被描述为一种知识生产策略。然而，在媒体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社会科学范式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很多场合，您都主张未来考古学应该由大学实验室和艺术研究所实施。从未来考古学的视角可以给媒体技术或媒体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什么？

齐：我早期在1970年代研究媒介时，主要遵循社会科学范式。哈贝马斯这样的诠释哲学家和其他来自实证社会研究或社会学的学者，在我们理工大学的媒体研究的基础课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大家在1960到1970年代研究大众媒介的使用和效果提供了宝贵养料。如果你仍然主要对效果研究感兴趣，希望探究媒体对人做了什么，它们对人的意识有什么影响，如何更有效组织消费者群体和商业或政治广告，甚至更紧密地遵循所谓使用与满足路径探究人们用媒体做了什么，那么继续批判地审视社会科学的方法当然是必要的。

然而，大约30年前，我的研究和思想发生了一次范式转变。我写完关于录像机这一特定技术物（视听时间机器）的学位论文之后，我开始对思与行、理论与创新（尤其是理论和艺术行为之间的交互）之间的内在辩证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正

如你在问题中所指，这与我作为一名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开始越来越关注年轻的创意人才——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音乐家——有关。审美诗意的问题和分析或哲学问题同等重要。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科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媒体艺术学院。它完全关注艺术、科学和技术三者间的充满张力的对话。在这种新型的艺术学院里，我们培养了一批媒体艺术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是世界各地的教授）。凭借能力，我们致力于应对先进技术给艺术创意实践带来的挑战。1995年，我创办了第一个数字节（DIGITALE），针对当时新的数字媒体。近期，我们的设备艺术年鉴正在重新结集发行……我在科隆、布达佩斯、巴塞罗那、奥地利、西班牙、瑞士、拉丁美洲和许多其他国家教过的那些崭露头角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电影制作人等，“贪婪地”汲取着关于各自研究事物起源的知识。从这些知识中，他们不仅获得了处理复杂物的经验，而且学会了当自己与深层时间经验和对象联系起来时，如何更好处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了解自己的起源，将其作为一种为未来的资源，同样意味着获得了一种生态学（ecological）态度。这不是在简单地利用过去的层叠，而是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宝贵并须受到尊重的资源。与此同时，媒体考古学被许多大学认可，并作为独立的教学科研领域被整合进课程体系。媒体考古学不是社会科学或社会学研究的替代，而是一种有效的、有时甚至令人不快的增量。对历史学来说亦是如此。我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是在福柯考古学的传统中大力发展起来的，并不是试图取代传统的历史研究，而是以一种批判并卓有成效的挑战姿态，作为其补充。

作者：联系到您上面阐述，媒体考古学作为一个补充，有时作为一个令人恼火的补充，能否促进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变？促进媒体考古学家和媒体技术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对话的最佳领域是什么？

齐：对我来说，定量和定性思维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应将它们理解为对立的，而应将其理解为合作的可能。媒介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们只能从那些认真考察具体技术装置或传播技术系统物质性，衍生流变和起源的同事身上获益。如果您想知道特定媒体如何发挥作用或特定人群怎样使用某些媒体，那么最好知道各个媒体的专有性质及其物质性逻辑是如何构成的。当然，媒体考古学家也应该对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问题抱开放态度。这最好在实践项目中展开——我在柏林艺术大学授课过程中，总是有很多关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前来交流。

作者：在讨论媒体思维与媒体实践之间的共构关系时，您提出撰写或思考一项技术本身可能会改变对象（以及面向该技术的实践）。考虑到这一点，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现在思考、书写和存档的方式？为了构建人类与技术建设性和谐相处的未

来，媒体学者可以尝试哪些实验方式，对当今的数字媒体归档？

齐：哲学家、作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过，我们用来写作的工具似乎也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我几乎每天都会做这个简单的实验。当我用钢笔书写时，与使用机械打字机或数字计算机时大不相同。我目前正在试着以新的媒介思维形态，写作一些短篇幅的歌词文本，最终文本会转变为声音刺激。我用最早的移动机械打字机之一Olivetti的Lettera 22型号机器写下这些抒情诗。打字韵律、机器节奏、声音、机械问题都有助于我的思想和最终文本的产生。这就是我一直关注的技艺与表达、技术与意义产生之间的内在互动，这也反映我在扩展物质学（expanded materiality）框架提倡的扩展解释学（expanded hermeneutics）中。

我们要深度卷入特定技艺的具体特征和物质属性。对技艺的探索和理解应该帮助我们借助技术做些别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功能的附庸。我需要什么样的技艺来完成这种或那种艺术项目？是35mm胶卷或数字视频、超8摄像头或我的可视电话、三维动画或现实增强应用程序、还是一把真实的小提琴或它的模拟……对于创意人员而言，这些都是决定性的问题。就数字媒体而言，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两类生产者和用户：一类数量相对较少的能够了解干预机器和软件的深层运作。他们可以干预数字媒介的结构，或批判或创造性地运作技术；另一类人则在机器表面跳舞，无法访问操作系统，源代码和软件应用程序。这类人使用媒介。我担心的是这两类用户越来越分裂，从而建立巩固了霸权关系。这种霸权不是我们为了将来的努力方向。

在我看来，现在年轻学者为期刊撰写的文章，与我这一代甚至更早一些的那些作者在学术交流中所写的文章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对此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我敢这样假设：一方面，如今的学术文本被编织在密集的网络化知识和无数出版物构成的网络中，它们自身就包含了紧密关联的网络化知识。另一方面，我在现在读过的学术论文中常常找不到作者自己明确强烈的立场。例如呈现的独特角度，对事实和语境进行原创阐释之后提出的决定性观点，尤其是一种“地平线思维”（德语：Horizontdenken）也就是对前景的梦想（dream forward）在现在的文章中都很少看到。这不是一种文化上的悲观评估，而是一种观察，并且与数字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技术所产生的特定效果有关。我们常常忘记媒体在历史上并非永恒。技术媒体是历史的插曲，这必然意味着数字化也只会是其中一个篇章。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赋予数字文化技术永恒的价值。一些人工智能技术最为先进的变体已经可以充当数字和模拟电子元件的“同体存在”，例如海德堡大学基尔霍夫物理研究所卡尔海因茨·迈尔（Karlheinz Meier）与其研究团队共同开发的神经形态的计

算机BrainScaleS便是范例。作为一名媒体考古学家，技术档案的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复杂。我想在这里表明立场，我认为在发达电子存储和传播技术的条件下，对档案概念进行修正是绝对必要的。受艺术和艺术家的影响，我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发明了一个新词——否档案主义“AnArchive”，它假设我们未来需要的结构和归类体系与过去不同。它们必须更开放，更容易获得。

我认为否档案（anarchives）是对档案（archive）的一种替代和有效补充。我有意使用这个词（anarchives）的复数形式。否档案主义在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逻辑中发展，因此特别适合类似事件和运动这样基于时间体验的感觉记录。否档案主义不要求领导权。它们不要求知道事物的来龙去脉。起源对其而言是且仍然是一个陷阱。否档案主义原则上不遵循外在的目标导向；它们是奢侈的，他们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并给我们送上了馈赠——艺术家和研究人员既需要从整体（部署）的角度出发，收集、选择、保存、修复和分类档案。他们同时也需要自给自足、抵抗、自主的且持续被激活的否档案。否档案须对档案观念造成挑战与刺激，否则将毫无意义。因此，否档案可能会帮助人们防止每一个特殊独特的集合在行政体制下发生嬗变。

作者：您提到了数据流的地下层正在与地表和地下所有的液化物质发生接触。由此，技术的逻辑性和物质性被投射到生活中。一种新的混合现实和一种新的具体化（concretizatio）形式适时涌现。如何看待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将新媒体技术与建筑或城市空间场景深度融合的做法？这是否会造成新的断裂和等级分化，从而促使未来的新材料对媒介创新和城市传播研究范式产生影响。为什么跨学科方法在此语境下很重要？

齐：我们对现实经验的混杂已经开始。许多客体不再被建造，而可以说是被种植。它们作为各种化学，生物或者生化过程（在德勒兹的哲学意义上）慢慢成长和成型。各种智能机器监视控制绿色空间的灌溉。不少大城市正在建造垂直花园。各种智能程序确保肉类或其他不可再生能源等稀缺资源的消耗被维持在与自然的合理契约所限定的范围内。然而，我坚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工程和设计艺术所面临的挑战，只能通过无条件的对话来应对。作为一名学者，我已经按照这个信念生活了大约50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获许被在柏林工业大学开设媒体研究和媒体咨询的第一门课程。从那时起我就将媒体视为一种话语间性（interdiscursive）的语境。媒体研究和分析中牵涉到语言学和符号学、电气工程和声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哲学、诗歌和文学研究、艺术史和技术史等诸多交叉领域。这些只是其中一些相关的学科。

现在，我甚至强烈倡议要设计全新的学科设置。它们将被置于现有学科之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研究生阶段展开。我不是从传统的学院和系所意义上去理解它们，而是将它们作为项目以及为了进入未来而建立的学科院系。在我们的大学里，这包括坚持互相对话，在赞扬和争论的时候进行眼神上的互动，在争端出现时通过直接对话寻求解决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对话（Dia-Logos），各种网络内外理性思想的交流对生存至关重要。它的前提是尊重他者，其中包括自然、事和技术。跨学科、交叉学科在一般意义上已经成为互补的术语，以此来应对坚不可摧的学科边界之间对话的缺失。

混沌先锋和恩典时刻诗人（chaos-pilots and kairos poets）：多年前，我建议学科培养这样一个先锋。在当前的全球瘟疫及其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刺激中，它可以有多重要这一点非常清楚。随着在媒介-人和媒介-机器等界面上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的迹象出现，创造力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能力。传统艺术家的模式——尽管在艺术领域即将走到尽头——却正在成为一种更广泛社会行动的模式。混沌先锋和恩典时刻诗人是未来的身份，他们不仅能够创造性地处理巨大的困惑和惊喜，而且能够组织这些困惑惊喜及那些能在影院、网上、舞台、画廊、演讲厅或博物馆捕捉和激发有效瞬间的人。若无对复杂性或对时间的态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先进的思维和先进的审美实践都将变得难以想象。最近，我正在罗列这样的未来所需求的院系清单，我希望其中一些能够实现。

作者：新闻和传播学项目如何利用其课程促进这种对数字时代广阔视野的考虑？您如何预见高等教育中新闻和媒体学科的未来？

齐：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柏林工业大学开设第一门媒体研究课程时，项目研讨会（project seminars）就已经成为我们培养年轻人媒介能力的重要教育工具。这些通常都是高度跨学科的课程项目。媒体创意学和媒体批判学领域的学生必须与机械制造专业人士、物理学家、艺术史学家、科学技术哲学家、符号学家等等一起合作学习。媒体是界面（德语：Schnittstellen）上的现象或事件。媒体发生在话语重叠和交叉的所在。媒体关联话语间性的（interdiscursive）问题。这应该是推动新闻传播课程设置的基本洞见。但是——甚至更重要，并且与第一点直接相关的是——媒体本身绝不能是最终目的。媒体教育不应该仅以自我为参照。我强烈呼吁恳求学科之间的融合。任何充满热情而坚定地想要学习媒体学的人，必须在其他领域的具备一定的知识或规划准备，可以包括工学、自然科学以及诸如艺术或设计等哲学及美学方面领域。

（责任编辑：谢卓潇）

注释 [Notes]

1. 图片由齐林斯基教授提供。
2. 图片来源：<http://variantology.com/?lang=en>，由齐林斯基教授提供。
3. 图片来源：<https://www.leonardo.info/review/2019/11/dia-logos-ramon-llulls-method-of-thought-and-artistic-practice>，由齐林斯基教授提供。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托马斯·埃尔塞瑟，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等（2020）。《在媒介与艺术的历史中探险——埃尔塞瑟、齐林斯基同中国学者的对话》。《文艺研究》，（5），91-99。
-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2002/2006）。《媒体考古学》（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Canclini, G. (2009). *Culturas Híbridas*. Madrid, ESPA: De Bolsillo.
- Dyson, F. J. (1979). Time without end: Physics and biology in an open universe.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51(3), 447-460.
- Hegel, G. W. F. (1991).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rrgang, D. & Zielinski, S. (2019). *Möglichkeitsräume-Forschung und Lehre in Kunst und Design*. Karlsruhe, GER: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
- Kapp, E. (2019). *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O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ga, A. Weibel, P. Zielinski, S. (Eds.) (2018). *DIA-LOGOS: Ramon Llull's Method of Thought and Artistic Practice*. Min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Zielinski S. (2002). *Archäologie der Medien: Zur Tiefenzeit des technischen Hörens und Sehens*. Leipzig, GER: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 Zielinski, S. & Wagnermaier, S. (Eds.). *On Deep Time Relations between Arts, Sciences Technologies*. Cologne, GER: Walther König.
- Zielinski, S. (2008).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Zielinski, S. (2013). *After the Media: News from the Slow-Fading Twentieth Century*. Minneapolis, MN: Univocal Publishing.
- Zielinski, S. (2019). *Variations on Media Thinking*.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